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

王京安¹, 赖景生²

(1.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重庆工商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W. A. 刘易斯指出, 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从信息和知识的角度看, 任何经济系统、组织、个人都是信息和知识生产、收集、传递及利用的装置, 二元经济形成的关键在于不同区域在信息和知识的生产、收集、传递及利用能力及效率上的差异。因此, 二元经济如何发展和转换完全取决于该区域内与信息和知识利用相关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 二元经济; 结构转换; 信息; 知识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439(2007)01-0031-05

The essence and path for structural change of dual economy

WANG Jing-an¹, LAI Jing-she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2.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W. A. Lewis pointed out that dual economy is the basic economic n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angl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ll of economic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s are the devic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s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the key to 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Thus, how dual economy develops and changes completely depend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dual economy; structure change; information; knowledge

一、二元经济理论: 进展、批评与视角转换

阿瑟·刘易斯指出, 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 现代“资本主义部门”是指那些资本家以谋取利润为目标, 使用可再生资本和雇佣劳工的经济, 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 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佣劳工、不谋取利润的经济, 即本地原有的传统部门或“自雇部门”, 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种二元结构差异表现在生产技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

场、区域经济等多方面。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 发展的核心在于重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 这可通过两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并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尽管这一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必要性, 但其生存收入、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假设及资本累积、增加投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政策等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对此, G. 拉尼斯、费景汉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 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研

* 收稿日期: 2006-10-08

项目基金: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CQZDZ200603)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基金(2005 年第一批)及南京大学博士后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王京安(1971-), 河北安国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博士后, 从事组织理论研究。

赖景生(1944-), 福建上杭人, 重庆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 教授, 从事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等二元经济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或双重二元结构、“民工荒”、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二元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修改理论假设和模型、更换药方,这包括从刘易斯的古典主义思路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 D. W. 乔根森(1967)、M. P. 托达罗(1969、1970)等在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及城乡就业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卡尔多、拉克西特等对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以及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超边际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经济分析中。其中,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释表明,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进,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结构将会消失。高帆等进一步明确了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上述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一方面相对独立地面对其特定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与一般理论的发展又有着一致性。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刘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个古典的结构主义的问题:二元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和消除的,对问题的分析却越来越远离刘易斯范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显然,刘易斯并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存在,更不会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取得了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一致性,那么针对一般理论的批评就同样适用于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样,已有的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资、技术进步、加强教育、制度变革等都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但也都存在理论和现实反例,更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二元性程度的差异。威廉·伊斯特利或许是正确的:实现高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需要许多特定政策和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总之,经济

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原则和理论解释,然而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审视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这种审视不仅是对理论本身,更需要哲学层面的反思。各种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概念界定等无不透露出其哲学态度。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经济学的哲学观总体上是物质本体论、牛顿主义的决定论和机械原子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等,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新古典范式形成中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因此,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论还是激进学派,无论是强调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技术进步或是制度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集中在了经济系统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强调对人进行激励的制度理论,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这无非是将人与物对应了起来,本质上讲是对人的物化,仍是从物的角度看待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通病。尽管 A.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还在强调经济学“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但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利己主义和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人性假设形成之后,经济学中“千人一面”,将人类比于物的基础已经形成,“人学”的声音就更难见容于主流经济学了。而迷恋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精美与严谨进一步地使经济学失去了在广泛的历史背景和多学科对话状态下反省的能力。对此,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过多地纠缠于 20 世纪前 1/3 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断地以更复杂、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使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

同时,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概括。拉尼斯强调,组织二元性的特点是“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而非“农业”与“非农业”以及不均衡体制刚性工资概念;柯利、墨菲、谢勒夫与维西尼等考虑了规模报酬递增问题;杨小凯将其转化为分工程度问题。而离开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则很难对二元经济问题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因

此,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要做深入分析,不仅要进一步地发掘问题的实质,还有必要重新选择研究视角,以便将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因素组织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二. 经济系统的运行与经济增长:基于信息与知识视角的理解

在经济学中,经济系统如何运行是其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似乎从来没有明确解释过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新古典经济学对此只进行了形式化而非深化和具体化。到目前为止,惟一给我们希望的是 F. A. 哈耶克。哈耶克认为,在劳动分工背后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知识分工”,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因为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识”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及其绩效。

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信息”与“物质”、“能量”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组织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因此,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就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在 K. 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为“世界 1”,主观经验(如思维过程)的世界称为“世界 2”,自主陈述的世界为“世界 3”——的基础上, M. H. 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

上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系统运行及经济增长的信息与知识的视角。而且,与基于物的视角的

传统理论相比,该视角在哲学上更站得住脚。从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系统的理解首先是从能够感知客观世界的个人开始的。人们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来获取、识别和理解信息,而认知结构则主要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获得的。而且,认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们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化、继承的社会模式和成规。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可以从周围世界中学到极不相同的处理信息的法则。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信息指导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并非仅依靠个人理性来引导他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行动,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方式来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处理已有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延伸我们的理性。

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环节的技术知识。在这部分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就是个人知识或内隐知识。另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交流的,但其中部分不适于大规模地交流,这构成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那部分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则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必须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交流成本的存在,在制度知识中,同样有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则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或称为潜规则)。

技术通过经验的不断地正规化、知识化和物质化,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操作规则和机械设备,规定和缩小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方向和范围,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与技术有关的信息/知识量。而市场、组织、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制度含义,不仅都表达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和知识获取、加工处理和使用的程序。只是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和知识的性质、分布及其范围是不同的,适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

理和使用。最明显的就是,市场适宜处理分散、不连续的信息和知识,而组织则适宜于依靠层级制处理连续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严格地讲,各种正规化的技术、技术物质化而形成的资本品、制度等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的“包裹”或“模块”,都是节约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条件,并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很显然,不存在劳动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为,我们就只需要有关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识,而不需要有关交易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尽管知识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增长却是极其缓慢的。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熟能生巧”,从而引发了技术创新和机器的发明。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缩小了个人处理的信息领域,使劳动者对所使用或生产的物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提高了其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并最终导致更为节省的生产方法的产生。而这往往是以技术创新、新机器等方式加以体现,这又意味着新知识和新信息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有的部分知识被新知识替代了,或者部分知识,尤其是部分作为特殊技能的内隐知识被物化在机械设备中了。此外,部分知识被证伪,也导致了其新陈代谢。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意味着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即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等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产业层次、加长了生产的链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是与有关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加剧了知识和信息的分散化,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程度,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使交易的数量、整体规模大幅度提高,交易信息也因而大幅度增加。

三. 信息和知识视角下的二元经济

在刘易斯、拉尼斯、杨小凯等的总结中,二元经济的本质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对立到劳动分工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逐步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如果接受哈耶克“在劳动分工背后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知识分工”的观点,二元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可理解为知识分工水平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

说就是不同部门、区域在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或水平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获取、利用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差异在物质世界中表现为技术水平、投资、区域、制度等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差异。

以个人为起点,一个区域或部门对信息和知识有效使用的能力由三个层次组成:

1. 个人层次。个人是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和利用的最基本单元,其能力主要取决于:(1)个人的信息模式(心智模式),是个人如何组织信息的基本结构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人对于哪种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更敏感、更善于处理和利用;(2)学习,是逻辑地将信息组织到自己已经有的知识体系中,并对已有体系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讲是能力的获取和提高;(3)教育,外界为个人心智能力提高提供的基本环境,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庭的道德熏陶、社区文化的影响等)。

2. 组织层次。组织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规则来实现放大和延伸个人能力。这取决于:(1)组织的层级机构及其与技术、组织的信息分布与发布特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2)组织领导的个人信息模式、能力大小及其与组织的匹配关系。

3. 环境层次。这里的环境是指个人和组织决策影响之外的因素,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如信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环境是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支撑,主要表现为个人和组织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易程度。如果环境蕴涵的能力是强大的,就会为个人和组织先期处理某些信息和知识,提供稳定、易处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约个人和组织的能力。D. C. 诺斯曾指出,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实质上是在向更有效率、更大规模地分享、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向转变。

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或部门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其中,组织和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能够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使个人能够借助组织和环境来提升其能力。这种能够在其内部顺利地传递、获取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范围,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信息和知识利用的“单元”。这种范围或“单元”并非仅指空间范围,而更多地是因为其具有

紧密的信息联系。这些“单元”与“单元”之间在信息和知识利用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其相互间的信息和知识沟通上存在某种阻碍,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二元结构的差异。这是对二元结构形成的静态解释。

如果将野中郁次郎的组织内知识转换与创新理论放大到一个区域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一个“单元”的知识利用过程。野中将奥地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运用到企业中,强调知识生产就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交互作用的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组织内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外化—联合化—内化”过程,使组织内的“显性知识”转换为个人的和组织的“隐性知识”,而只有“隐性知识”内化于个人和组织之后,知识才能被利用并形成各种能力。同时,在这种知识的转换循环中,新的知识又被创造出来,从而进一步提升个人和组织的能力。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当组织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时,新一轮的知识螺旋又开始了。如果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知识与信息交换考虑进来,那么整个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通过知识的螺旋式交互作用来实现新知识创造的开放系统。从社会经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分工深化的过程。而知识分工水平的改变也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向消除二元结构的方向发展。

四.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途径

本文不准备提供一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完整而具体的药方,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持续地提高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及能力。从这个原则出发,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然而,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径,它们是否有效,从静态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其能否转化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转换途径能否持续地发挥效力,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导致了知识创新的螺旋式地循环上升了。

参考文献:

- [1]陈宗胜.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2](美)费景汉,G 拉尼斯. 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4]黄泰岩.“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 经济学动态,2005,(6):15-17.
- [5]王检贵. 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J]. 经济学家,2002,(2):45-50.
- [6]高帆. 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 经济研究,2005,(9):91-101.
- [7]辛念军,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 教学与研究,2005(10):76-82.
- [8][澳]杨小凯.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9](美)威廉·伊斯特利.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 [10]贾根良. 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 社会科学战线,2006,(1):56-71.
- [11](英)A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12](美)R W 福格尔. 经济学要与时俱进[M]//吴敬琏. 比较(5).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93-108.
- [13](英)F A 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4](英)K 波普尔. 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5](英)M 布瓦索. 信息空间[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16]傅组芸. 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
- [17](日)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18]王京安. 企业规模决定论:基于信息和知识的解释[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 [19]王京安. 区域信息能力及其经济增长含义[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版),2006(3):84-88.
- [20](美)D C 诺斯.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 改革,1995(3):52-56.
- [21](日)野中郁次郎,等. 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M]//(德)M 迪尔克斯,等. 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夏冬)